

王明蓀主編

古代歷史文化

研究
輯刊

五編 第五冊

漢靈帝時期的政局

陳鏘懋 著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古代歷史文化

研究
輯刊

五 編

王 明 蓀 主編

第 5 冊

漢靈帝時期的政局

陳 鏘 懋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漢靈帝時期的政局／陳鏞懋 著 — 初版 — 新北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1〔民 100〕

目 2+162 面；19×26 公分

（古代歷史文化研究輯刊 五編；第 5 冊）

ISBN：978-986-254-419-8（精裝）

1. 漢靈帝 2. 東漢史

618

100000575

ISBN-978-986-254-419-8



古代歷史文化研究輯刊
五 編 第 五 冊

ISBN：978-986-254-419-8

漢靈帝時期的政局

作 者 陳鏞懋

主 編 王明蓀

總 編 輯 杜潔祥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所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人 高小娟

聯絡地址 新北市永和區中正路五九五號七樓之三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電子信箱 sut81518@gmail.com

初 版 2011 年 3 月

定 價 五編 32 冊（精裝）新台幣 56,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漢靈帝時期的政局

陳鏘懋 著

作者簡介

陳鏞懋，1970 年出生於嘉義市，1994 年從國立台中中興大學歷史系畢業，於澎湖服役兩年後開始從事教職，2007 年取得國立嘉義大學人文藝術學院史地學系碩士學位。目前服務於嘉義市立北興國民中學，擔任歷史科專任教師兼任導師職務，曾任嘉義市北興國中教師會理事、社會科召集人，平時熱愛旅遊或以學術交流方式參訪名勝古蹟，藉此縱情山水之間，自許以「快樂說書人」為志業。

提 要

本文研究目的，主要是探討漢靈帝時期的政局演變，如何使東漢王朝迅速地走向分裂與衰亡，又隨著靈帝朝的結束，中國歷史隨即從大一統的秦漢帝國，進入了多元而分裂的魏晉南北朝時代，開啟了中古史的新頁，如此關鍵的發展階段，已具備了歷史研究上的特殊性與重要性，靈帝朝之覆亡，絕非單一因素能夠決定，而是朝廷內、外各個層面彼此之間的交互影響所致。

靈帝朝實際上已背負著東漢建朝以來所累積的許多政治包袱，例如內部的戚宦相爭、黨錮之禍以及外部的邊境消極政策以及豪族勢盛……等，但若只以“積弊難返”為由來看待靈帝朝導致東漢的滅亡，也未臻完善。本文將靈帝朝步向分裂與衰亡的複雜成因與影響層面，採核心（靈帝的出身）、縱向（朝廷內部）與橫向（朝廷外部）三個部分進行析論，本文共分為六章：

第一章「緒論」：提出以「漢靈帝」為研究議題之緣起與析論之方向，將有關靈帝本身的史料，佐以東漢衰亡之相關前人研究成果，加以回顧與探討，以闡明「漢靈帝時期的政局」在東漢衰亡的歷程當中，所扮演之特殊與關鍵的歷史意義。

第二章「士風的沉淪」：以兩次黨錮之禍為時空背景，切入本文的核心部分，介紹靈帝的家世出身，以及靈帝即位之初隨即面臨宮廷內部各方勢力之間的鬥爭，並探討黨禍後靈帝的因應態度、內政上所作的改革以及賣官鬻爵的貽害。

第三章「軍事國防的緊張」：東漢建朝以來對邊疆採消極退讓政策，因此邊族入侵襲擾不斷，已成為靈帝朝廷外部的巨大壓力，除了造成邊地緊張、人民飽受征調之苦以外，所投入鉅額的軍旅費用，已達耗竭國庫，動搖國本的地步。

第四章「社會經濟的衰敗與失序」：東漢是豪族地主持下所建立的王朝，朝廷的官僚、外戚，以及地方的州郡長吏、富賈地主等，都是豪族出身，豪強競相兼併土地，使得農民生活困頓、流離失所，終於引爆了反政府的「黃巾民變」。

第五章「戚宦相爭的延續與擴大」：主要探討黃巾民變後，靈帝之皇權如何對其下官僚士大夫、宦官、外戚之三大政治勢力集團，作出有效的統馭與制衡，最後因地方行政制度的變革，與中央戚宦再度惡鬥，使地方與中央呈現分裂之局。

第六章「結論」：綜論各章節之要點，舉出研究成果、心得以及檢討本文研究之侷限與未及之處，最後期許未來研究之遠景。



目

次

第一章 緒 論	1
第一節 研究緣起與取向	1
第二節 前人研究成果	3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各章節 主題	11
第二章 士風的沉淪	15
第一節 第二次黨錮之禍	15
第二節 靈帝的因應措施與改革	26
一、靈帝的因應措施	26
二、靈帝的改革	29
第三節 賣官鬻爵	35
第三章 軍事國防的緊張	43
第一節 東漢的邊疆政策	43
第二節 北方的鮮卑與烏桓	50
一、鮮卑	50
二、烏桓	55
第三節 南蠻與西南夷	60
一、江夏蠻	60
二、西南夷	61
三、板楯蠻	62
四、武陵蠻	64
第四節 西羌	65

第四章 社會經濟的衰敗與失序	79
第一節 經濟社會的窘境與惡化	79
第二節 五斗米道與太平道的興起	88
一、東漢晚期宗教興起之背景	88
二、五斗米道的興起	91
三、太平道的興起	84
第三節 黃巾民變的爆發與靈帝朝的對應	98
一、張角起事（中平元年二月）到病亡（同年八月）	101
二、張角病亡（中平元年八月）到張寶戰死（同年十月）	105
三、黃巾餘部的發展（中平二年）到靈帝病死（中平六年）	106
四、黃巾民變的影響	108
第五章 戚宦相爭的延續與擴大	111
第一節 靈帝與官僚士大夫集團	111
第二節 靈帝與宦官集團	117
第三節 靈帝與外戚集團	126
一、母系竇氏的敗亡	126
二、妻系宋氏、何氏與王美人	127
三、母系董太后與妻系何皇后的鬥爭	132
第四節 地方割據與中央分裂局面之形成	134
第六章 結 論	141
附 錄	147
參考與徵引文獻	151

第一章 緒 論

第一節 研究緣起與取向

歷史的發展過程中，本是連續不斷的進行著，是不可分期的，但為求研究上的方便，史學家通常會以偏重政治層面，也就是各個朝代的更迭進行切割，透過分期來明瞭歷史的變化與真相，另外，就是仿自西洋史的分期法，以中古、上古、近代之階段〔註 1〕發展來進行論述，「東漢王朝」則兼具了這兩種分法之關鍵地位。隨著東漢的衰亡，政治演變邁向了分裂的三國時代，不僅宣告著上古時期的結束，中國歷史更是由大一統的秦漢帝國進入了分裂且多元的魏晉南北朝時代，開啓了中古時期的新頁。

東漢政權的建立，始於光武帝建武元年（25 年），劉秀在王莽政權滅亡後的幾個武裝集團中異軍突起，以光復漢室為號召，在豪族地主的支持下，平定了地方割據勢力，中國再度由分裂步向了統一，直到獻帝延康元年（220 年），曹丕篡漢建魏稱帝後，東漢終告結束。王朝先後歷經了光武帝、明帝、章帝、和帝、殤帝、安帝、順帝、沖帝、質帝、桓帝、靈帝、少帝以及獻帝（見附錄一），國祚共計 195 年，而中國也再度由統一陷入了分裂的局面。無論我們以朝代更迭或者是以階段發展來看待歷史的演進，東漢王朝所代表的是一種關鍵與過渡的重要階段，透過研究東漢由興盛到衰亡的發展歷程，便可窺探大時代轉折的脈絡。

〔註 1〕 雷海宗，〈斷代問題與中國歷史的分期〉，收於《中國通史論文選》，台北：華世出版社，1979，頁 65。

東漢王朝的衰亡，其內部最明顯的危機便是幼主即位，戚宦惡鬥、循環相爭的政治亂象，在朝政日益敗壞、宦官亂政的情況下，官僚士大夫與太學生等知識份子發起反宦官貪污腐敗的運動；朝廷外部也因外族寇擾邊地，使政府財竭兵疲，人民飽受徵調之苦，加上地方豪強地主交相欺凌百姓，於是民思爲亂，終於爆發了全國性的黃巾民變……，由此觀之，東漢衰亡之原因絕非單一因素能夠決定，而是廣泛地涵蓋了政治、軍事、社會、經濟、文化等各個層面彼此之間的交互影響所致。

學術界對於東漢作專門論述的專書並不多，大部分是以秦、漢兩朝爲共同研究階段的《秦漢史》型態呈現居多，就秦漢史的發展歷程裡，便可看出歷史分合興衰的態勢。國學大師錢穆先生曾在《史學導言》中提到：「綜觀我國自古以來的歷史，政治的分、合、治、亂、盛、衰，朝代的興、廢、存、亡，主要關鍵在人。」〔註2〕朝代的分合興衰確實是勢在人爲，特別“興”與“衰”的關鍵統治者所處的時空背景與主客觀條件，特別是靈帝本人的出身背景，以及在他的周圍影響其舉措行事的朝廷成員，例如外戚、宦官以及官僚士大夫等，另外就是朝廷外部有關邊患引發的國防軍事問題，豪強地主所引發的社會經濟問題……等，這些不同層面的歷史現象，都值得我們進行原因之歸納與探究。

學術界對於漢靈帝的專門研究，可以說是相當的缺乏，因此本文將研究焦點放在「漢靈帝」一朝之多面向原因之分析，試圖說明及強調東漢王朝分裂與衰亡，最確切的起始與爆發點，都發生在漢靈帝在位期間。

綜合以上所述，本文欲探討的主題有以下幾點：

第一、靈帝出身之時空背景，是否影響其主政風格與績效？以及與靈帝最親近的生母董氏和宦官們的行事作風，對於朝政的衰敗是否具有直接或間接之關係？

第二、靈帝朝之士風爲何明顯沉淪？士人對政局亂象能否採取有效監督與革新之功用與行動？官僚士大夫爲何開始對國家產生嚴重的離心？

第三、東漢建朝以來，內部的政治紛擾（戚宦相爭）與外部的國防軍事（邊患）、社會經濟（豪強侵奪）等問題已積弊許久，爲何會在靈帝朝總體爆發成反政府之民變運動？

第四、靈帝對於政治危機的應變、處理能力，以及事後因應措施所產生的後續影響，如何造成東漢衰亡與分裂之局面。

〔註2〕 錢穆，《史學導言》，台北：中央日報社，1975，頁31。

第二節 前人研究成果

一、通論方面

如前所述，有關靈帝朝的專門論著，為數不多，大部分是以秦、漢兩朝為共同研究階段的《秦漢史》型態呈現為主，從研究秦漢史的發展歷程中，除了針對東漢後期，特別是靈帝朝至東漢結束這段期間的研究成果加以蒐集、耙梳之外，對於靈帝朝導致東漢的衰亡與分裂，更能藉此得到較具全面性的背景史料，對本文之研究頗為必要。

專書方面，重要的著作有勞榦的《秦漢史》〔註3〕，內容偏重政治方面，也論及制度、學術思想與物質生活方面。鄒紀萬的《秦漢史》〔註4〕，仍偏重政治史的發展，但書中搜集歷史圖片與相關地圖，與文字部分交錯排列，有助於對史實之深刻瞭解。姚秀彥的《秦漢史》〔註5〕，以秦漢的政治事件為主，最後一編則論及官制、武功、邊患、兵制、刑法、賦役、社會、經濟與學術等，雖然篇幅比重較小，但仍有助於全面性之瞭解。其中較為重要的專論著作有翦伯贊的《秦漢史》〔註6〕，其內容涵蓋經濟、政治、文化、民族等各個方面，撰述資料豐富，並充分利用考古資料與報告，使文獻和考古資料得以互相參證。林劍鳴的《秦漢史》〔註7〕，除了基本政治演進之外，並且專章討論漢族與其他民族之關係、社會生活與經濟發展、科學技術以及思想文化……等，又能將較新之考古史料彙編於其中，算是當今較新且全面的專論著作。

除了秦漢兩朝的專史外，由英國學者崔瑞德著，韓復智主譯的《劍橋中國史·秦漢篇》〔註8〕也是頗具參考價值的通論專書，是一部完全由西方學者撰寫的中國歷史，在許多歷史問題上對中國學者的傳統學說提出了新的觀點和質疑，能讓我們參酌不同的價值判斷，特別是對靈帝朝的外戚、宦官、官僚士大夫集團以及整個漢代的衰亡，多有著墨與見解。

〔註3〕 勞榦，《秦漢史》，台北：中國文化學院，1980。

〔註4〕 鄒紀萬，《秦漢史》，台北：長橋出版社，1979。

〔註5〕 姚秀彥，《秦漢史》，台北：里仁書局，1981。

〔註6〕 翦伯贊，《秦漢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原為《中國史綱》第二卷《秦漢史》。

〔註7〕 林劍鳴，《秦漢史》，台北：五南出版公司，1992。

〔註8〕 〔英〕崔瑞德著，韓復智主譯，《劍橋中國史·秦漢篇》，台北：南天出版社，1996。

錢穆的《國史大綱》〔註9〕以綱目體論述史實，其議論與見識多富民族情感，對於東漢末的黨錮之禍以及學術思想的轉變，有其深刻獨到的看法。

另外，專以東漢一朝爲主的論著有楊東晨的《東漢興亡史》〔註10〕，該書各章以東漢諸帝爲標題，作出整體介紹與評價，對於中央和地方廉吏多有評論；有關宦官、內寵採取具體人或事的分析；太后臨朝與外戚權臣亦有深入探討；對諸郡、縣及少數民族的“叛亂”性質，其正當性與否亦有所評斷，特別是漢靈帝的部分也作專章完整的介紹，對於筆者在論述上有極大的參考價值。

專門以漢靈帝爲題的論著有徐難于的《漢靈帝與漢末社會》〔註11〕，該書有別於一般偏重政治事件的論述，能夠專以靈帝爲中心，對於漢末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民族關係等現象進行綜合考察、分析，特別是以靈帝所處的政治、社會環境對於靈帝行事的影響，注重挖掘人物本身的心理層面之活動，設身處地去思考與探索靈帝的想法，再以有系統的史料來佐證之。這樣的論述方式，不失爲是一種新的研究方法，兼具“實驗”與“創新”的精神，對於筆者在本文的論述上也多有啓發與助益。

如同本文所強調的，靈帝朝爲東漢衰亡分裂之關鍵，且爲下啓三國魏晉之過渡，因此《三國史》論述有關三國形成背景之部分，對本文的寫作亦極具參考價值，特別是馬植杰的《三國史》〔註12〕，可以說是研究三國史最重要的代表之作，該書第一章便以“東漢王朝的衰落”爲題，概括性地討論東漢後期的宦官擅權、士人階層與宦官的鬥爭，以及黃巾起義與東漢王朝的崩潰。本章開頭便闡明東漢王朝的壽命，實至靈帝於中平六年（189年）死亡，董卓率軍進入洛陽爲止，本文主旨已呼應了這樣的論點與看法。

二、重要主題方面

就本文各章的重要主題，參酌重要專書以及相關之專篇期刊論文，以下擇其重要主題介紹：

（一）關於黨錮之禍

靈帝朝士風沉淪，對士人造成最大的衝擊與摧折，是爲靈帝即位前後的

〔註9〕 錢穆，《國史大綱》，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4。

〔註10〕 楊東晨，《東漢興亡史》，西安：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

〔註11〕 徐難于，《漢靈帝與漢末社會》，濟南：齊魯書社，2002。

〔註12〕 馬植杰，《三國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兩次黨錮之禍，這方面相關議題的研究相當的多，顯見該議題的歷史地位以及受學者看重的程度。金發根在〈東漢黨錮人物的分析〉〔註13〕一文中，將東漢黨人的構成、地域分佈、出身、風尚、抱負、政治主張、仕宦、隱居等作出系統之歸納與探討，特別是黨人之間門生、故吏的特殊情誼，已超越了對國家及君主的忠忱，如此風氣與錢穆先生所強調東漢士人的道德偏狹，只注重個人家庭和朋友，而忽略了社會和國家，〔註14〕其看法是相吻合的。

劉元虹在〈東漢士人的救國運動〉〔註15〕一文中，就東漢士人的新地位、士人對外戚與宦官的反對、士人對邊防的建議、士人對人主之諫諍、士人的節操與影響提出多面向的討論。羅彤華的〈東漢黨人之士氣與義行——兼論黨錮之禍的起因〉〔註16〕就當時士人特重修持高節、動則思義的角度，來論述當代士風以及黨錮之禍的起因。劉明東在〈東漢士人之出仕觀念分析〉〔註17〕一文裡，深刻探討士人面臨東漢後期君主的無道，在理想與現實的衝擊下，仕或不仕已成為難以抉擇的考量，然而在無法改變現實環境的情況下，士人的隱逸風氣儼然形成。

辛旗〈王符的社會批判思想與東漢末年清議思潮〉〔註18〕一文，對於士大夫與太學生的「清議」有其深入之討論，認為最初為太學生與士族知識分子品評擇官的社會輿論與道德評價由指向人格才幹轉向朝政，終招致宦官集團的鎮壓，成兩次“黨錮之禍”。士人懼於殘酷的殺戮，清議開始變成地方士族知識分子相互激勵的一種道德行為，並與民間鄉飲酒禮相結合。

日本學者渡邊義浩《後漢国家の支配と儒教》〔註19〕的著作，在第二篇〈儒教国家の展開〉的第七章“党錮”裡強調：黨人對於政治環境的不滿，最關鍵的因素就在於宦官對於察舉的壟斷，使得在政治界裡正常的階層流動方式變得非常的困難，於是黨人不得不採取向擁有皇權為靠山的宦官集團進行公然的挑戰，然而這卻是種極度危險的行為，黨人也因此付出了慘痛的代價。

〔註13〕金發根，〈東漢黨錮人物的分析〉，《史語所集刊》34本，1963。

〔註14〕錢穆，《國史大綱》上，頁143。

〔註15〕劉元虹，〈東漢士人的救國運動〉，《嘉義師專學報》，1974：5。

〔註16〕羅彤華，〈東漢黨人之士氣與義行——兼論黨錮之禍的起因〉，《中華文化復興月刊》，1988：11。

〔註17〕劉明東，〈東漢士人之出仕觀念分析〉，《輔大中研所學刊》，1996：6。

〔註18〕辛旗，〈王符的社會批判思想與東漢末年清議思潮〉，《甘肅社會科學》，1994：3。

〔註19〕渡邊義浩，《後漢国家の支配と儒教》，東京：雄山閣出版株式会社，1994。

以上的見解與看法，對於筆者釐清黨錮之禍的緣由、影響，以及對靈帝朝士風沉淪與對國家離心形成之論點，得到有力的佐證與說明。

（二）關於邊防與羌族

靈帝朝時常處於邊患威脅不斷的危機當中，北方是繼匈奴之後興起的鮮卑、烏桓，西北主要是羌族，西南則有南蠻與西南夷，中央政府為防禦邊患，投入的軍旅費用相當可觀，內耗嚴重且已動搖國本。討論漢族與北方游牧民族之間互動關係的通論性研究較豐富，陶晉生〈邊疆民族在中國歷史上的重要性〉〔註 20〕一文，分析邊疆民族入主中原的頻繁及原因，邊疆民族和漢民族相處的幾個模式，以及邊疆民族對於中國文明發展的影響…等議題，特別兼採西方學者與日本學者的看法，避免純以漢族的角度來看待邊疆民族，而能夠以多面向的角度來探討。

蕭啓慶在〈北亞游牧民族南侵的各種原因的檢討〉〔註 21〕一文中認為：主張「掠奪」為游牧民族的重要生產方式的多為日本學者，如青木富太郎、護雅夫、江上波夫等人。這兩篇重要的專論，使筆者對於游牧民族的生活型態以及他們「掠奪」農業民族的多方面動機與意義，有更深一層的瞭解。金發根在〈東漢至西晉初期中國境內游牧民族的活動〉〔註 22〕一文探討兩漢征伐游牧民族的邊疆政策與東漢中葉後的邊患，直至漢末三國時期與游牧民族、晉初游牧民族之內遷與分佈，所述及的民族涵蓋靈帝時期的鮮卑、烏桓、西羌等族，對各族具有全面與整體性的瞭解。

有關靈帝時期各邊族之研究，田繼周的《秦漢民族史》〔註 23〕對於秦漢時期中國境內邊族有全面詳實的介紹，如東北諸族的鮮卑、烏桓；氐羌族系；

〔註 20〕 陶晉生，〈邊疆民族在中國歷史上的重要性〉，收錄於《中國通史論集》，台北：華世出版社，1987。

〔註 21〕 蕭啓慶，〈北亞游牧民族南侵的各種原因的檢討〉，收錄於《中國通史論文選》，台北：華世出版社，1979。日本學者對於游牧民族「掠奪」所持的理由是：「由於草原社會的生產力不穩定，工藝技術落後，難於累積財富，所以聚眾掠奪是游牧民族社會的一種自然的無償輸入行為；藉以解脫困厄，或增益生活內涵。」

〔註 22〕 金發根，〈東漢至西晉初期中國境內游牧民族的活動〉，《食貨月刊》復刊第 13 卷，1984。

〔註 23〕 田繼周，《秦漢民族史》，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6。本書屬於《中國歷代民族史叢書》八部史書中的第二部，被列為中國社會科學院重點科學研究項目。

巴郡、南郡、武陵諸郡蠻和西南夷……等，該書除了對靈帝朝時期的重要邊族所處的地理環境、發展歷程等方面，配合史料予以陳述之外，也能深入探究邊族叛亂起事的主要原因與動機，頗能以對等之態度來看待史實。

東漢邊防政策的研究也受到關切與重視，黃今言〈說東漢在軍制問題上的歷史教訓〉〔註24〕一文，檢討了東漢在軍制改革上產生的利弊得失，特別是光武帝為求中央集權所作的諸多改革，已造成兵員罷省失度，戰略後備力量薄弱；軍隊缺乏訓練，素質差，戰鬥力不強；官無警備，沒有鞏固的邊防，釀成長期的邊患等，對於光武帝以“柔道”治國的方針，在邊防上顯得退縮保守。韓復智〈東漢由統一走向分裂的本源〉〔註25〕一文，亦對光武帝變革地方軍制有所評議，認為是光武帝個人私心所致，是以強幹弱枝、預防反側，以鞏固政權為目的。陳曉鳴〈籌邊失當與東漢衰亡〉〔註26〕一文，以東漢壓縮武裝力量和調整兵役制度，削弱了邊防軍事實力和戰略後備力量；又“以夷制夷”羈縻失當，激化了民族矛盾，釀成長期邊患；以及放棄邊郡經濟的開發，使得籌邊經費過重，增加了國家財政中的軍費負擔……等，這些因素已可視為是東漢衰亡的主要原因。

靈帝朝籌邊耗費最大的是防禦羌患，研究羌族問題有管東貴〈漢代的羌族〉（上）、（下）〔註27〕，討論的項目有：羌族與漢代邊疆問題、羌族之種別名稱、活動區域與文化概況，以及羌與鄰族的關係等。隨文將史記、漢書、後漢書等所記載到的羌族種別名稱列表呈現，在查詢與研究上相當方便。管東貴另外在〈漢代處理羌族問題的辦法的檢討〉〔註28〕一文，著重在漢朝對付漢羌衝突所採用的辦法：方法有屯田與行恩德以「防」；棄邊以「讓」；以及揮軍以「伐」，作者認為以「防」為最好的辦法。闕鎬曾〈兩漢的羌患〉〔註29〕

〔註24〕黃今言，〈說東漢在軍制問題上的歷史教訓〉，《南都學壇》（哲學社會科學版），1996：2。

〔註25〕韓復智，〈東漢由統一走向分裂的本源〉，收於《中國歷史上的分與合論述研討會論文集》，台北：聯經出版社，1995。

〔註26〕陳曉鳴，〈籌邊失當與東漢衰亡〉，《江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2：11。

〔註27〕管東貴，〈漢代的羌族〉（上）（下），《食貨月刊》，復刊第一卷，第一期，1971：4。

〔註28〕管東貴，〈漢代處理羌族問題的辦法的檢討〉，《食貨月刊》，復刊第二卷，第三期，1972。

〔註29〕闕鎬曾，〈兩漢的羌患〉，《政治大學學報》，1966：12。

29) 一文裡也分析東漢對羌用兵措敗的原因，特別指出東漢政府對羌的政策混亂，勦撫不一、屯田或遷徙也缺乏定論，因此東漢對於羌患總是用兵失敗且窮於應付。

因此我們看到了漢靈朝不但有鮮卑持續寇亂，又有漢人與烏桓大人的結盟，以及漢人與羌胡的聯合叛亂……等，顯示出政治腐敗的情況下，邊防策略也隨著搖擺混亂起來，朝野動蕩不安可想而知。

(三) 關於豪族、社會經濟與黃巾民變

東漢是豪族地主支持下所建立的王朝，朝廷的官僚、外戚，以及地方的州郡長吏、富賈地主等，都是豪族出身，他們競相兼併土地，進而引發諸多社會經濟問題。楊聯陞〈東漢的豪族〉〔註 30〕一文，對於豪族的源流發展、豪族在政經地位上的影響，以及豪族之間因政治利益衝突所產生的內鬥……等，作出全面性的探究，特別是對本文具有相當的啟發：認為東漢皇室本身、外戚、官僚士大夫，甚至是宦官集團，都可以說是豪族出身，東漢末的外戚宦官以及士大夫間的政治鬥爭則可視為是清流豪族與濁流豪族之間的鬥爭史，這樣的論點為靈帝朝紛亂的政局，立下了一個正確的註解。

崔向東的《漢代豪族研究》〔註 31〕一書，從豪族的定義、形成、發展與演變，及其對兩漢政治、經濟和文化等方面所產生的重大影響，參酌大量古今中外史料，認為豪族的概念，〔註 32〕在於“豪”突出了豪族所具有的強力性，即豪族擁有政治權力、經濟勢力和軍事勢力；“族”突出了豪族所具有的宗族性、社會性，並且從國家與社會的關係角度來探查，認為研究豪族是解讀兩漢乃至魏晉諸多社會問題的關鍵。

余英時〈東漢政權之建立與士族大姓關係〉〔註 33〕一文，提到東漢政府開始注意到豪族土地兼併與奴婢買賣的迅速發展，並對其展開限制的行動，

〔註 30〕楊聯陞，〈東漢的豪族〉，《清華學報》11：4，1936。收於《中國通史論文選輯》，台南：久洋出版社，1985。

〔註 31〕崔向東，《漢代豪族研究》，武漢：崇文書局，2003。

〔註 32〕崔向東，《漢代豪族研究》，對於豪族在不同時期的發展中，第一期：在漢初到武帝期間，可視為各游離勢力逐漸融入國家權力結構中，並遵從主權所支配的秩序。第二期：武帝到王莽時期，則是豪族的官僚化與世官化。第三期：東漢建立以後，豪族開始呈現出「士族化」的特色。

〔註 33〕余英時，〈東漢政權之建立與士族大姓關係〉，《中國古代知識階層史論》，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89。

足見豪族勢盛已經影響到整個國家的社會經濟問題。韓復智〈兩漢經濟問題的癥結〉〔註34〕一文提出兩漢經濟的根本問題，就是土地兼併和商業的畸形發展，尤其是東漢時期因大地主的聲勢已凌駕資本家之上而變成輕商，而這些大地主當然就是朝野的豪強大族，也說明了農民飽受官府與民間豪強的多重剝削。

有關東漢政府針對土地兼併所提出的對策，在韓復智〈東漢的土地問題〉〔註35〕一文裡有限田、井田之不同解決方式的探討。勞幹〈戰國秦漢土地問題及其對策〉〔註36〕一文也明白指出東漢土地改革的失敗，關鍵就在於統治者本身即為經濟上的既得利益者，在顧及統治者自身以及政權支柱的官僚之利益前提下，圖謀改革的學者和政治家即使作出再大的努力，也是徒勞無功的。

當政府無法改善每況愈下的民生經濟，農民生活困頓，三餐無以為繼，人禍為害若再遭逢天災肆虐，農民則成為流民、盜匪，孫如琦〈東漢的流民和豪強〉〔註37〕一文提出了這樣的看法，並且強調頓失依靠的流民若轉化成激烈反抗政府的軍事力量，這即為政府最大的警訊，因此安撫與安頓流民，便是朝廷的當務之急。然而以靈帝朝當時內外交迫的窘態來看，不但無法解決人民生計之基本所需，而只是讓這些問題不斷地惡化下去。

朱大昫主編之《中國農民戰爭史》秦漢卷〔註38〕專章探討東漢豪族地主的腐敗統治和各族人民的悲慘境遇，強調農民反抗政府的起義行動，就是階級矛盾普遍尖銳激烈的深刻反映，在當時民間宗教信仰廣為流行的情況下，利用神權及教義來號召農民，組織反政府的起義運動，成為東漢中後期最嚴重的社會問題。文中對於「黃巾起義」的背景、成因、爆發、經過以及後續餘部的發展……等，都予以詳實的描述與分析，特別是評論黃巾軍本身的弱點及缺失，以及黃巾軍失敗後所形成的割據勢力及彼此間的兼併混戰，實為靈帝朝開始潰散的重要關鍵。

薩孟武《中國社會政治史》〔註39〕一書，雖訂名為“社會政治史”，但

〔註34〕韓復智，〈兩漢經濟問題的癥結〉，《思與言》5：4，1967。收於《中國通史論文選輯》，台北：臺灣書局，1969。

〔註35〕韓復智，〈東漢的土地問題〉，《國立編譯館》6：2，1977。收於《漢史論集》，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0。

〔註36〕勞幹，〈戰國秦漢土地問題及其對策〉，《大陸雜誌》，第2卷，1951：5。

〔註37〕孫如琦，〈東漢的流民和豪強〉，《浙江學刊》，1993：3。

〔註38〕朱大昫主編，《中國農民戰爭史》秦漢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註39〕薩孟武，《中國社會政治史》，台北：三民書局，1998。

內容確能廣泛地探討政治、軍事、經濟、社會與文化等多面向的歷史成因，有助於筆者在論證上的能參考更多有關民生經濟層面的論點。作者在論及「黃巾之亂」之成因時，提到：「當政府不能保護人民，人民只有反抗政府，於是知識階級的改革運動失敗後（黨錮之禍），又變成下層階級的暴動，終而發生了黃巾之亂。」以靈帝朝社會變動的角度來看，這段敘述頗具見解。

這裡必須特別強調與說明的是，漢靈帝中平元年（184年），張角以太平道聚眾反抗政府一事，因立場與史觀的不同，則出現三種不同的名稱：

第一、「黃巾之亂」：是指聚眾為匪、劫掠州府，是以反政府的叛亂集團來看待。

第二、「黃巾起義」：認為是人民對於暴政的本能反抗，屬於官逼民反下所引發之革命運動，是以農民起義事件的肯定態度來看待。

第三、「黃巾民變」：筆者使用“黃巾民變”一詞，同時兼具上述兩種特性，故在本文的論述上，將此歷史事件以「黃巾民變」來稱呼，是以中立的態度來看待。但是在徵引文獻方面，為求對於原作者之尊重，就必須援用原文裡的名稱，因此本文對此歷史事件的敘述，將出現以上三種不同名稱。

（四）關於戚宦相爭

史家對於東漢的中衰，最常見的評論即是：「“外戚”與“宦官”的循環相爭。」的確，以靈帝朝來觀察，這句話可視為是最確切的例證，從靈帝的即位到死亡，外戚、宦官多次的政治角力，到最後則兩敗俱傷。

王連升《中國宮廷政治》〔註40〕一書分別以〈外戚的困惑——外戚干政問題分析〉，以及〈皇帝的家奴——宦官擅權現象剖析〉兩章進行分析論述，對其角色之歷史淵源、發展、在各領域的表現，以及對朝廷的貽禍……等，給予完整性的介紹與探討。王林子〈兩漢外戚宦官專權問題論述〉〔註41〕一文，分別論述了外戚、宦官專權的產生、相互擅權、專權的憑藉，以及外戚、宦官專權是皇權的異種形式，強調皇權仍是具有駕馭戚宦的主動權，戚、宦之命運仍是取決於皇帝的意志，最後則討論外戚、宦官政治的黑暗面。

靈帝朝時期外戚與宦官的鬥爭，宦官在第二次黨錮獲勝之後，在政治權勢上一直佔著上風，余華青的《中國宦官制度史》〔註42〕一書，對於宦官在中國

〔註40〕王連升，《中國宮廷政治》，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2。

〔註41〕王林子，〈兩漢外戚宦官專權問題論述〉，《天水師專學報》（哲社版），1996：1。

〔註42〕余華青，《中國宦官制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